

# 食物來源与人口增長

孙敬之著

科学出版社

# 食物來源與人口增長

王澤平著

新華書局

食物来源与人口增長

孙敬之著

## 內容提要

这本小册子是作者 1956 年出席印度阿里迦国际地理学讨论会所作的报告。文章开始就世界范围食物增产的可能性說起，再就社会制度改变后，解除人为障碍的新中国解决食物与人民生活的事実，說明增加生产与合理分配是解决食物問題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而且也揭穿了那些用“人多地少”做为向外侵略借口的不切实际。文章指出向外侵略絕不是人多的“罪过”，而是由於資本主义制度的存在，由於金融寡头貪多無厭的企圖。

## 食物来源与人口增長

著者 孙敬之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北京朝陽門大街 117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業許可證出字第 061 号

印刷者 北京西四印刷厂

总經售 新华书店

1957年3月第一版  
1957年3月第一次印刷  
(总)0000—9,269

書号：0685 印張：3/4  
開本：787×1092 1/32  
字數：15,000

定价：(9) 0.15 元

“食物来源与人口增長”問題，是一个十分龐大而复杂的問題，它联系到社会制度、生产技术、社会習慣、衛生条件、食物热量与营养……等許多方面。可是，我只是一个經濟地理工作者，所以只能从糧食增長数量与速度以及人口数量与增殖速度的关系方面，做初步簡略的理論与事实的說明，作为大家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

我首先从世界談起：

地球表面有陸地 1.49 亿平方公里，根据 1953 年 联合国農業統計年鑑”(1954 年版) 的統計，包括菓园在內，現有耕地 13.3 亿公頃，仅佔陸地面积 8.5%；即以瓦格納 (Wagner) 对地球可利用土地数字 (40%)<sup>1)</sup> 較低的計算，全世界可耕地仍为 59.6 亿公頃，相当現有耕地的 4.4 倍。实际上在科学不断进步的情况下，可利用的耕地是远远大於上述数字的。即使現在所利用的 13.3 亿公頃的耕地，分布也很不均匀。在現在世界各个国家中除了英、比、荷等国土地利用率稍高外，澳大利亞联邦的耕地只佔土地面积 1.4%，巴西只佔 2.2%，南非联邦只佔 5.7% (1953 年联合国統計)；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也不过佔 13% 左右。而且，現在世界上就是連最肥沃的黑土与黑土性土壤，最多也不过利用了

1) 根据 K. U. 普拉索洛夫院士統計，全世界可利用土地为 100.5 亿公頃。

Ravenstein 估計可耕地佔陸地面积 61%。O. E. Baker 估計可耕地为 42%，我引用的是較低的估計。

35%，中部非洲、热带澳洲、伊里安、英屬婆羅洲等地，絕大部分土地還沒有触动过。已經利用的土地，由於社会条件和技术水平的限制，一般的講，所得到的报酬还是很低的。如根据 1953 年联合国統計，世界各国大米平均产量高下相差 4 倍，而小麦平均产量上下相差 6 倍。这就是說，假如社会条件与技术条件具备的話，單位面积产量是可以大大提高的。

表 1 (單位：公斤/公頃)

小 麦	最 高	3,990 (丹麦)
	最 低	430 (南非联邦)
大 麦	最 高	3,510 (丹麦)
	最 低	810 (突尼斯)
玉 米	最 高	5,070 (比利时)
	最 低	110 (贝專納)
稻 米	最 高	5,770 (西班牙)
	最 低	700 (法屬西非)

註：上表由联合国統計折算

据联合国 1948—1950 年統計材料，全世界每年平均产谷物約 6.0 亿吨(1953 年为 6.558 亿吨)。以現在全世界 25 亿人口計算，每人每年平均可得 240 公斤原糧，如除去种籽、飼料、釀造等消費 50 公斤，每人尚可分得 190 公斤。再加上世界每年所产 2,710 万吨以上的魚产，約 4,152 万吨的肉(以上均缺苏联数字)，約 25,000 万吨的乳<sup>1)</sup> 和很大量

1) "Yearbook of Fishery Statistics" 1952—1953 F. A. O.; "Yearbook of Food and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1954 F. A. O.

的水菓和蔬菜当然要超过上述数字。因此，我們可以說，假如食物分配合理，假如各国之間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互相帮助，互通有無，世界人民所創造的食物及其他財富，是可以維持世界現有人口的飽暖的。但是，实际上，現在世界上却有几亿人口得不到飽暖，經常过着饑餓和貧困的生活。这主要是由於劳动人民生产出来的食物，沒能进行合理的分配，却被少数人用各种方式(租、稅、高利貸、不等价交換等)掠夺去了。有些国家，一方面把食物腐爛在倉庫里卖不出去，或者傾倒在海里；另一方面却是無力購買食物的饑餓者，欲食而不得。一方面高呼“人口过剩”；另一方面却把許多已耕地荒廢起来。在食物与求食之間，隔上了一条“無情”的鴻溝。

而殖民主义者，在各处进行掠夺和侵略，使很多地方都不能普遍的發展工業，不能合理的利用土地發展生产，更加重了殖民地人民的貧困和灾难，中国人民在全国解放前的一百年中已經尝够了这种滋味了。

但是，饑餓現象的产生，馬尔薩斯主义者一般的均归罪於‘人口生殖速度超过了食物生产的速度’。〔这一句話是馬尔薩斯“人口若沒有妨碍，是以几何級数增加；但是生活資料，只以算术級数增加”(Population, when unchecked, increases in a geometrical ratio; subsistence only increases in an arithmetical ratio)的同義語〕。这是馬尔薩斯在資本主义經濟危机尖銳化、表面化、失業人口增多的时候，所主观臆造的規律，是反科学的。从世界的觀点看來，絕對人口过剩的規律，是在任何历史时代都不存在的。假如真有这样絕對人口过剩的客觀規律，社会怎能向前發展呢？所以，过去有不少持有科学态度的学者，引用了許多事實，

否定了馬爾薩斯的論點。如 Warren Thompson 教授研究 1871—1910 年歐洲和美洲各國糧食每年平均增加率為 2.2—4.3%<sup>1)</sup>。美國糧食研究所研究 1885—1934 年世界小麥產量每年平均增加率為 2.1%<sup>2)</sup>。而澳洲統計專家晶比斯 (Knibbs) 計算 1804—1914 年世界每年人口增加率平均僅為 0.864%<sup>3)</sup>。而韋爾柯 (Wilcox) 教授計算 1650—1929 年共 280 年世界人口只增加 3.9 倍<sup>4)</sup>，平均每年增加 0.49%。就現在中國人口增殖率每年平均也不過 2% 左右。此外，克魯泡特金證明法國 1789—1897 年，小麥增長 2.5 倍，人口增殖僅為 40%<sup>5)</sup>。和前國際聯盟計算全世界（中國及蘇聯除外）1913—1927 年 14 年間，糧食增加為 13%，而人口增加僅為 9%<sup>6)</sup>。雖然這些統計材料不完全，統計的年代也不一致，可是它畢竟告訴了我們一個總的趨勢，明確的指明了食物增長速度永遠超過人口增長速度這一事實。假如馬爾薩斯的斷言正確的話，從 1798 年到現在，全世界人口應當是 550 億，實際上只有 25 億，馬爾薩斯曾斷言，歐洲在二十世紀初年，人口將達到 17 億，也落空了。而 1925 年世界人

- 
- 1) W. Thompson: *Population, A Study of Malthusianism*,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p. 58, 1915.
  - 2) M. K. Bennett: "World Wheat Crops, 1885—1934" *Wheat Studies*, April, p. 264, 1935.
  - 3) G. H. Knibbs: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Population*" Melbourne, 1917.
  - 4) 1650 年世界人口為 4.65 億，1929 年為 18.2 億。各時期之人口增加率不同。轉引自梁慶齡著：“世界糧食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
  - 5) Kr. Podkin 的統計材料系轉引自 S. V. Pearson: "*The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London, p. 54—55 1935.
  - 6) League of Nations: "*Memorandum on Production and Trade*" 1929.

口也不过 18 亿，1954 年不过 25 亿稍多一点。人口沒有按照馬尔薩斯虛構的規律發展，其中确有社会原因的阻碍，可是，即使把一切災荒死亡和战争死亡人口加上，这种論斷与事实仍然是相差很远的。假如馬尔薩斯的断言正确的話，那么，为什么在近百年来很多人口增殖率下降的国家，失業人口反而逐漸增多了呢？为什么那些国家人民生活水平不但沒有提高反而降到一般水平之下了呢？

从此可知，貧困的根源不是由於食物生产少，也不是由於人口增加快，主要是分配不合理。主要是生产力發展受着人为的阻碍。問題的實質不是世界上沒有足够的粮食供給广大貧困与失業的人羣，而是因為他們無力購買粮食。請看下列 1953 年联合国农業統計年鑑所載数字就明白了。

表 2 全世界各洲人口和粮食总产量及每人平均数字(每人平均数字根据 1953 年联合国农業統計資料折算)

地 区	人 口 (千 人)	粮食总产量 (百万公吨)	每人平均粮食 (公斤)
亞 洲	1,374,390(包括苏联亞洲部分 55,890)	284.3	206
歐 洲	553,010(包括苏联欧洲部分 151,110)	120.5	217
非 洲	213,000	33.9	159
大 洋 洲	13,900	7.3	525
北 美 (包括中美)	229,700	178.6	777
南 美	118,200	31.2	263
全 世 界	2,508,200	665.8	261

从上表可以看出，北美洲（包括中美）每人每年平均 777 公斤粮食，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数字。其中，美国是粮食

出产最多的国家，根据 1950 年統計(1948—1950 年平均數字)，美国产糧 1.6 亿公吨，而同年人口不过 1.5 亿，那就是說美国每人每年可以分到 1,000 公斤的糧食<sup>1)</sup>。假如真正实行合理分配的話，美国人应当是吃得最飽国家之一(个人平均量仅次於苏联)，可是，根据美国官方統計，1950 年有失業和半失業人口 1,450 万(实际上为 1,800 万以上)<sup>2)</sup>。这怎能用“人口增加速度超过食物增長速度”去解釋呢？同年，美国食物儲存量值 26 亿美元<sup>3)</sup>而不卖給飢餓者，又怎能用“人口增長速度超过食物增長速度”去解釋呢？美国糧食产量，虽有波动，但也不断增加，而生产糧食的大多数农民却一天天的增加他們的負債数和吃不飽飯，又怎能用“人口增加速度超过食物增長速度”去解釋呢？

可見，目前資本主義世界飢餓者日益增多，其最基本的原因絕不是由於糧食生产不足，而是由於糧食不能合理的分配給人民。

## 二

我不在世界範圍內多談了，現在要轉到我們的祖國方面來談一談。众所週知，我国的土地只佔全世界陸地面積 $\frac{1}{15}$ ，而人口却佔全世界 $\frac{1}{4}$ 。所以，过去許多人一直为中国“人口过多”擔憂。如馬爾薩斯說：“由生殖力看來，中国人口能够容易加倍，这和美国是同样的。但是我們知道，中国的土地不能維持这么多的人口，这是極其顯明的”。如美国白皮書中艾奇遜先生致杜魯門先生的信里，提出了一項‘吃

1) 牛津世界經濟地圖說明。

2) 瓦爾加：帝国主义經濟与政治基本問題，第 52 頁，人民出版社出版。

3) 同上，第 65 頁。

飯問題”，他這樣說：“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紀增加了一倍，因此，對於中國成為一種不堪重負的壓力”。如葛德石先生(George B. Cressey)在其所著“中國的地理基礎”(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中有一個標題叫“人口壓力”，他這樣寫道：“饑饉只是由於通常人口的增加，超過了食物供給的結果……大多數中國人民處於危險的較低的生活水準，假如中國要增加物質的繁榮，那似乎難免要減低其增殖率”。但是，歷史發展已經說明他們所擔心的問題，已經在新中國得到解決，農民都有土地種了，在人口不斷增長的情況下糧食也够吃够用了。當然我們自己對這些初步的工作成績還是遠不滿意的，我們還要繼續創造更大的成績。

舊中國災荒和饑餓的現象是十分嚴重的，據中國科學家的研究，從一世紀到十九世紀，有紀錄的旱災達1,013次，水災658次，其他災害也在數百次以上。就拿近代的災荒說：如1928—1930年大旱，波及陝西、河北、山西、山東、安徽、湖南及內蒙西部等七個省區，受災縣份900個以上，受災人口達9,400萬。1931年山海關以南18省遭受水災，災民達一億以上<sup>1)</sup>。每次大的災荒，人口死亡以數十萬至數百萬計。即使在丰收之年，多數勞動人民仍然過着“糠菜半年糧”的生活。但是，和世界情況一樣，災荒貧窮的主要原因，無論如何也是不能用人多地少來解釋的。而是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受着人的阻礙，利用與分配不合理。比如那時農民每年收入有50—80%為地主、官僚資本家和殖民主義者直接、間接的掠奪去了。因此，農民終年勞動不能得到溫飽，在無可奈何時，只有向土地“竭澤而漁”，當然更談不到

---

1) 見黃澤著：“中國的天災問題”，商務印書館，1935年。

改良农具、提高产量和储备渡荒了。再加上旧政府不顾人民的死活，遇到荒年，不能把余粮区的粮食运到灾区和缺粮区。所以，就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大量逃亡和耕地面积减少、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形势<sup>1)</sup>，造成了荒年则“死亡枕积”，丰年则“谷贱伤农”的奇怪现象，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

可是，按旧中国1931—1936年每年原粮生产平均数字仍为1.401亿公吨，每人每年平均原粮尚达280公斤，如除去种籽、饲料、酿造，尚余230公斤原粮，假如能合理分配是可以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的。

### 三

由於解放前十数年战争的破坏，1949年中国粮食收获量仅相当过去最高年平均产量75.45%，鱼产相当过去30%左右，乳肉和蔬菜也大大减产了，农具被破坏了30%，役畜减少了16%，许多沟渠、水井被淤塞了，到处散布下害虫的种子——它给恢复和建设工作，带来许多困难，但是，中国人民是不怕困难而且是可以克服困难的。在1949—1950年

1) 根据原北洋政府农商部统计折算，1914年全国有耕地10,522公顷，1918年下降为8,763公顷。根据国民党政府主计处统计，1928年为8,325公顷。这些数字虽然不一定完全可靠，但表现耕地减少的总趋势，大体还是可以参考。

单位：公斤/公顷

	稻米	小麦	高粱	谷子	玉米
1936年	2,633	1,133	1,568	1,320	1,320
1947年	1,853	1,035	1,260	1,043	1,283

此表根据严仲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56页折算，科学出版社，1955年。

之間，經過糧食大調運，把余糧區積存多年的糧食運到缺糧區，消滅了“谷賤傷農”和“欲食不得”的現象，保證了全國人民基本上够吃。接着就開始了各種經濟的恢復建設工作，使糧食的產量不斷上升，從這裡就看出合理分配是何等重要了，也充分認識了解除束縛是有多么重大的意義。我願把這些經驗，簡單地向大家介紹一下，可能是有好處的。

我們做了那些工作呢？

首先，為了滿足人民的要求，進行了“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清除了農業落後、人民貧困的社會根源，這樣，分給了三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 4,700 萬公頃耕地，把過去大約每年交給地主、富農的 3,000 萬噸糧食的負擔（它佔農民收入的 50—80%）解除了，取消了數十種到一百數十種的租稅。使農民有可能把這一批資財投入到生產上去，現在只收相當農民收入 13% 的一種農業稅，而且還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這就是農民生產興趣高漲的原因。因為人民確實明白了，用自己的血汗換來自己貧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天自己的勞動卻是為了國家的富強和自己的幸福。

第二，合作化運動高潮的到來。“土地改革”打破了封建枷鎖，清除了農業落後的根源，但農民還不能一下子就擺脫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貧困，所以他們都願意走社會主義合作化的道路。1956 年年底，我國 5 億農民們絕大部分在完全自願和互利的基礎上參加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中來，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合作化。我們的合作化就是把農民組織起來，統一的使用土地，統一的分配勞動力。這樣，就為合理的利用土地（種植各種適宜於各種土壤的作物，實行合理的輪作或間作，增加複種指數……）、改良土壤、改良品種、興修水利、改進農具和耕作方法創造了條件，因而也就能提高

單位面積產量，把農民引導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把農業生產最大限度地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上來。眾所週知，在舊中國，農業十分落後，土地分散得十分零碎，各顧自己，難相為謀，再加上租稅重重，收穫大部分為地主、富農搶去，所以沒有力量抗拒各種自然災害，因此就不能不“靠天吃飯”，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也不能合理的、科學的利用土地。古代人民所積累的很多豐產經驗，也不能廣泛的推行。所以農業合作化運動迅速而普遍的開展是中國農民們的一件劃時代的喜事，它根本改變農村經濟的面貌。我國工業建設有力地推動了農業的發展，而農業合作化的完成，又轉過來有力地推動了工業、運輸業的發展。新中國國民經濟各部門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互相配合，共同前進的，這也是我國國民經濟迅速發展的原因之一。

第三，為了增加生產，保證農業收穫的穩定性，我國進行了一系列的防洪、防旱、防風沙、防蟲害和水土保持等改造大自然的工作。舉其要者：如治理淮河，是我國第一個多目標的全流域的治水工程，從1950年到現在，已經完成潤河集大水閘工程和佛子嶺等6個水庫，再加上湖泊和窪地的蓄洪工程，已能蓄洪230億立方米，大大的減輕了水災的威脅。到治淮工程全部完工時不僅可以解除700年來的災難，而且可以灌田333萬公頃，以每公頃增產300公斤計，可供350萬人一年的食用；荊江分洪工程的完成，穩定了洞庭湖區——中國米倉——73萬公頃良田的收益，保障了江漢平原533.3萬公頃耕地的安全；在河南北部，1953年建成了“人民勝利渠”（引黃灌漑濟衛工程）灌地48,000公頃，而且把衛河的航線由天津一直通到新鄉來；修建了官廳水庫，不僅使永定河下游過去常被淹的53,000公頃耕地收穫得到

稳定，而且可供給北京一部分水和电。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区、甘肃等省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用他們的双手，修建了許多渠道，开垦了許多耕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此外还應該提出的，在政府的援助下，迄1956年5月底止农民打井450万眼<sup>1)</sup>，自动的修建了小型渠道、塘、堰工程1,000多处，也充分說明了农民生产的積極性。迄1956年6月中国水利工程共做土工54亿立方米，石工4,764万立方米，混凝土170万立方米，假如把这些土石修成一条高寬各1米的牆，可以繞地球135週<sup>2)</sup>，合作化高潮到来以后，各种羣众性的工程当可大大超过上数。

中国西北半部風沙逞兇，已經數千年了，曾經到过中国西北和內蒙古的人們，都亲眼看到那些农田和村庄被埋在沙漠里的荒涼景象。我們国家为了永久根絕这种災患，从1950年起就开始了东北西部和內蒙东部防护林帶的营造工作（二者全長2,683公里，面积共約1,700万公頃），到1967年全部完成时，可以扩大耕地180万公頃，并保証附近同数量土地每公頃增产30%。从陝西北部的府谷到甘肃酒泉营造了一条西北防护林，全長1,200公里<sup>3)</sup>，可以保数百萬公頃的农田。河南东部黃泛区防护林已經收到很大的效益，全部完成后可以保护农田13万公頃。河北西部的固沙林也已經起了很大的作用。再过几年，这些沙海就要被树海淹没掉！而更振奋全国人心的是偉大的黄河綜合规划，我

1) 合作化运动高潮前打井148万眼，自1955年10月—1956年6月底止，据不完全的統計，打井累計为450万眼以上。

2) 按水利部統計折算：1955年为118周。

3) 原計劃長1,500公里，現拟分为陝北、陇东与肃北二部，故改为1,200公里。

們不仅要在四、五十年內免除黃河水患，擴大灌溉地 733 萬公頃，而且還要修 46 座壩，使“憂患的黃河”發電 2,300 萬瓩。把它的航程由 160 公里，擴展到 3,610 公里，使大陸中心的蘭州變成一個直接通往海洋的城市。為了增加和穩定收穫，1949—1955 年擴大灌溉地近 580 萬公頃，改進了 2,400 萬公頃的灌溉排水系統，全部水田和灌溉地面積達到 31,591,333.3 萬公頃，較 1949 年增加 21%。（其中水田增 16%，水澆地增 71%）擴大灌溉地和水田是有重大經濟意義的，因為水田生產一般高於旱田一倍以上，把旱地變成水田，每公頃平均可以增產 750—1,125 公斤以上。我們還要繼續擴大水田計劃 7—12 年內基本上消灭普通旱災和水災。

根據美國社會學家布里騰研究的結果，全世界因病蟲害每年減產的糧食，可以養活兩億人口。這個觀點是符合實際的。所以，消灭病蟲害的影響，是有巨大的經濟意義的。我國，人們為了保證農業生產的穩定性，和不斷提高糧食產量，已基本上消滅了蝗害，並正在消滅著其他蟲害，還要在今後 7 年內，消滅麻雀和老鼠，其中僅消滅 5,000 萬只麻雀，每年就能減少 25 萬噸糧食的損失，消滅老鼠，在保護草原與糧食上收益比此數還要大幾倍。

為了防止耕地中表土的沖刷，使“無山不綠，有水皆清”，在全國各地，進行了一系列的水土保持工作，5 年（1949—1955 年）來，我們造林 570 萬公頃<sup>1)</sup>，使 4 萬公頃的沙荒變成良田，使 1 萬公頃的薄地變成肥地<sup>2)</sup>，封山育林 486 萬公頃，種草 9,000 萬公頃，它們可以控制的面積近 2 萬平方公里。另外修谷坊 180 萬座，大小留淤壩 2,130 座，防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林業部統計。

2) “中國林業”1955 年 8 月號，第 7 頁。

止冲刷的田間工程(如梯田……等)64 万公頃。我們要在 7 年(1956—1962 年)內,基本上消灭沙荒,在 12 年內(1956—1967) 在可能条件下綠化全中国。以上各种成績都是我国数亿人民亲手創造的,今后計劃的完成,也会在我們的努力下得到保証,在这里就显示出“人口众多”的好处来了!

第四,改进耕作技术,扶植农業的發展。1952—1955 年政府在农業上的支出已达 8 亿多万元,水利支出 15 亿元。推广新式畜力农具 100 多万件,建立国营农場 2,251 个(其中机耕农場仅 106 个),拖拉机站 132 个(拖拉机 2,327 台),农業技术推广站 3,600 个,农業科学家培育出許多适合地方条件和收成高的优良品种,如碧瑪一号小麦、帽子头水稻、金皇后玉米、华农四号谷子、打罐錘高粱和滿倉金大豆等 280 多种。据現在統計,农民自己也創造出 1,300 多种因地制宜的新品种。

中国农業科学家还在西藏高原上試种成功了 20 多个作物品种,因为日照時間長等条件,这些作物产量均較平原为高。为提高藏族同胞的生活水平开闢了广闊的前途,証明了西藏高原不只能种植青稞,而且还能种植其他作物。中国人民解放軍在西北的垦植經驗証明,西北干燥区的土壤是極肥沃的,只要能用新的技术解决水的問題,就可以得到高額的丰收。此外,还推行了精耕細作、增加肥料等措施,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国进行了这一系列的艰巨工作,才能从 1949 年每人平均原粮 210 公斤增加到 1954 年的 282.5 公斤,更进而增加到 1955 年的 300 公斤原粮。据中国的可靠計算,城市每人每天有 0.6 公斤的糧食,平均可得到 2,100 卡路里的热量,再从蔬菜、肉类中吸取一部分,热量是够用的。以粮食